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三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一年三月

《利瑪竇中國札記》Scielou 人名考

夏伯嘉*

全文考證《利瑪竇中國札記》Scielou 一人的身分。耶穌會士利瑪竇成名史冊，實拜明末士宦的提攜。其中的一位大官，帶利氏離開廣東北上。前人照《中國札記》的音譯，多猜此人為石星。本文引用了中、西史料考證，提出 Scielou 應是抗日援朝戰役中的兵部侍郎孫鑛，並敘述他的家世、和耶穌會士羅明堅於一五八六年的相遇，與日後提攜利瑪竇的因緣。

關鍵詞：孫鑛 利瑪竇 朝鮮之役 孫鑑 羅明堅

*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講座教授

一・引言

明末天主教的先驅者，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於一五八二年抵澳門，在華輾轉二十餘年，躋身士宦名流，一六一〇年卒於北京，神宗萬曆皇帝特諭禮葬，日後揚名中外史冊。利瑪竇在中國的經歷，大致可分為兩段：自一五八二年抵達澳門、一五八三年入內地的肇慶轉至韶州，一共在廣東長達十二年，艱苦傳教，鬱鬱不得志可算為他事業的前半期。利瑪竇傳教的分水嶺，是一五九四年四月離開廣東，翻越梅嶺，沿贛江北上，初訪南京，再置身南昌，以後先名揚南京，再在北京結交名流顯貴，刊書載道，聲名大噪。這十六年是他事業的後期。綜觀利瑪竇一生，一五九四年四月可算是關鍵的一刻。正如日後天主教士大夫李之藻評說：¹

爾即利氏之初入五羊也，亦復數年混跡。後遇瞿太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蓄髮稱儒，觀光上國。

利瑪竇搖身一變，棄僧袍、穿儒服，能夠離開廣東這個討厭「番僧」的地方，實在拜一位高官的提攜。利瑪竇在他的札記中，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有下列一段話作交代：

利瑪竇神父在北京兵部侍郎的陪伴下前往南京，他的姓名是 Scielou，是一位很有名氣的人，廣西省人，曾任各高職，後投閒置散居家。在這時候，關白君，日本的領主（筆者按：指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中國的進貢國。故此，中國的皇帝想以八萬大軍援朝，而召此人入京以治朝鮮軍務。²

¹ 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收入劉凝編，《天學集解》（荷蘭：萊頓大學東方圖書館複印本），卷一，頁54。

² Matteo Ricc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vol. I of *Fonti Ricciane*, ed. Pasquale D'Elia (Rome, 1942-49), pp. 338-339: "...il P. Matteo fu verso la Corte di Nanchino in compagnia del Scilan del Tribunale delle cose di Guerra in Pacchino, di cognomen e nome Scielou. Questo era uno huomo di molta fama, della provincia di Quansi, che, avendo avute varie dignità nella Cina assai grandi, se ne era poi raccolto in casa e stave senza officio. Con tutto, cominciando in quell tempo il Cambaco, Signore del Giaponne, a far guerra alla Coria, regno tributario della Cina, gli voles il Re della Cina soccorrere con un essercito di più di ottanta mila huomini; e per dar buon ordine a questa guerra, chiamava quest'huomo alla sua corte in quell'officio..."

這位大官前往韶州特地拜訪耶穌會士亦有一番背景。他二十二歲的兒子，因鄉試考秀才落選，精神沮喪憂傷，請了幾個大夫看病亦沒有用。利瑪竇又說：

在他的故鄉，很接近肇慶的地方，他曾聽聞神父們的知識與品德，以及他們崇拜天主。由此之故，他來這裏希望能夠靠著他們的德行與祈禱，把他的兒子治好。³

第一位考證 Scielou 身分的學者，是前羅馬大學漢學家與耶穌會士德禮賢神父 (Pasquale D'Elia, 1890-1963)。德禮賢編輯校訂《利瑪竇中國札記》的意大利文原稿，考訂了利氏手稿以羅馬字母拼音所寫的中國人名，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因此，德氏的《利瑪竇史料編》三大冊，是研究明末天主教最基本的材料。德氏所考訂的中國人名，絕大多數被學者認同，偶有近代學者稍作增補改正。⁴ 德氏的意文版本，亦成為中文譯本的正典，如臺灣光啟出版社的《利瑪竇全集》便是一例。⁵

在考證 Scielou 此人的註腳，德氏提出這位大官是兵部尚書石星。德氏主要的理由是 Scie 音與 Shi (石) 很相近，而運籌兵部的大官，只有石星一人的姓比較接近利瑪竇的拼音。可是，德禮賢的考訂只是一個推測，故此，他於註文中在石星名字後加上兩個問號以示質疑。⁶ 光啟出版社中譯本的編譯，卻置兩個問號不理，以 Scielou 直指石星無疑。光啟版《利瑪竇全集》治學粗疏，錯誤之處不少，這就是一個例子。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亦同樣在註中指明「一般認為此人為兵部尚書石星」。⁷

首位質疑德禮賢之考證石星一人者是福建師範大學的林金水教授。在《利瑪竇與中國》一書中，林氏寫曰：「至于這位兵部侍郎是誰，有待人們作進一步考證。」《大西洋泰利先生行迹》說是「少司馬石公者，亦敬愛利，遂攜利子之南郡」。德禮賢暫考為「石星」。據《明史稿·石星傳》和利瑪竇關於這位侍郎的

³ Ricc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p. 340: “Sino dall' sua terra, che sta vicina a Sciaochino, aveva udito grandi cose della virtù e sapere de' Padri, e che adoravano a Dio; perciò gli venne nel pensiero che forsi, con la loro virtù e oration, potrebbono guarire suo figliuolo.”

⁴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⁵ 劉俊餘、王玉川、羅漁譯，《利瑪竇全集》（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

⁶ Ricc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p. 339, N-432.

⁷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195。

記載，兩者顯然不是同一個人。林氏論證主要理由有三點：（一）利氏稱兵部侍郎石星自一五九〇年一直任兵部尚書；（二）利氏說這位大官在一五九四年奉詔帶兵朝鮮，而石星早在一五九二年戰爭爆發至一五九七年冊封豐臣秀吉失敗，詔令下獄前一直負責朝鮮的戰事；（三）利氏說這人在廣西有盛名，石星不是廣西人，且又沒有任過廣西巡撫或兩廣總督。林氏又指出，萬曆朝抗日援朝之役奉詔入朝帶兵的有顧養謙與孫鑛，他們都領兵部侍郎銜。林氏曰：「孫 (Sun) 與石 (Shi) 讀音相差不是太遠，惟孫鑛于萬曆二十二年 (1594) 替代顧養謙，因此亦難斷定是孫鑛。」⁸

本文之旨，在林氏推測之上，作進一步的考證，深入分析利瑪竇書信與明代萬曆朝之文獻，提出 Scielou 一人，最有可能是孫鑛的論證。本文論點首先提出否定石星是 Scielou 其人的推測，再略述孫鑛的家族，與孫鑛、石星二人經略朝鮮軍務的始末。最後以利瑪竇的書信和另一位耶穌會士羅明堅的記錄，分析推論孫鑛與 Scielou 應為同一人。

二・石星與 Scielou 非一人考

石星，字拱辰，東明人，嘉靖四十四年 (1565) 進士。隆慶元年上疏陳弊引起帝怒，幾乎死於廷杖下，黜官為民。萬曆元年再起任故官，進陞尚寶少卿、大理丞、南京太僕卿，後陞遷僉都御史、右副都御史。萬曆十五年二月，石星從兵部左侍郎陞任工部尚書，轉戶部，九月加太子少保。萬曆十八年三月任吏部尚書，八月改兵部。兩年後，寧夏哱拜反，石星條上方略，平叛有功，加太子太保。萬曆二十年 (1592) 春，豐臣秀吉興兵二十萬入侵朝鮮，明朝遣發援軍，雙方各有勝敗，中、日進行和議。石星信任游客沈惟敬，力主封貢和議，及後雙方談判破裂，日軍復犯朝鮮，石星為眾彈劾。神宗大怒，於二十五年二月治罪石星，革職候勘，九月下獄；二十七年九月石星死於獄中。⁹

從以上《明史》的記載，石星任職兵部左侍郎是一五八七年（萬曆十五年）以前的事。而利瑪竇與這位大官認識的時候是一五九五年四月，石星正在京師忙於處理與日本和戰的問題，不可能遠遠出現在廣東的韶州。再者，利瑪竇很清楚的在不同的書信中，指出這位大人的官職是兵部侍郎，而不是兵部尚書。利瑪竇

⁸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38。

⁹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最早提到這位貴人，是他一五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致他澳門上司，葡萄牙耶穌會士孟三德 (Duarte de Sande) 的一封信。這時候，利瑪竇已安身在南昌，自離開韶州，經江西，遊歷南京，再回到南昌才四個多月，記憶猶新：

有一位大官叫 Xeye 的經過韶州。他是某省的都堂大人，就是巡撫大人……在家投閒了幾年，現在上北京陞任官職更大的叫兵部侍郎，就是皇帝座下兵部三大官員之一。¹⁰

這一封信是用葡文寫的。利瑪竇一直以 Xeye 稱呼這位兵部侍郎。Xeye 一名，稍後再作分析，先看看利瑪竇其他書信中對這位大人物的記載。

在一封一五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利瑪竇有下列一段話：

今年四月在韶州，我才剛剛接待好郭靜居 (Lazzaro Cattaneo) 神父來代替麥安東 (Antonio d'Almeida) 與石方西 (Francesco de Petris) 兩位神父（筆者按：兩位傳教士皆病死於韶州），有一位大貴人經過。他正在上北京朝廷陞為軍事顧問。他說聽過我們的名氣，想與我們談談他兒子的事情。他帶來了一個二十二歲的兒子，有點瘋了，希望我們能夠唸經去把他治好。¹¹

這封信最重要的訊息，是指出這位貴人拜訪耶穌會士是為了要找他們為他的兒子治病。這是考證 Scielou 身分的關鍵之一，稍後再詳述。

利瑪竇有關這件事的第三份記載，是一五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寫給羅馬總會長 Claudio Acquaviva 的書信：

今年四月有了一個機會發展，因為一位大人要去北京朝廷任兵部要職。他的姓叫 Scie，名叫 Lou，所以叫 Scielou。¹²

¹⁰ Matteo Ricci, *Lettere* (1580-1609), ed. Francesco D'Arelli (Macerata: Quolibet, 2001), pp. 197-198: "...passando hum grande mandarim de alcunha Xeye pela cidade de Xaucheo que for a primeiro tutão de huma provincia, conven a saber governador...de pois de estar recolhido por algum tempo em sua casa, agora lhe derão em Paquin, corte onde esta o rej, outro officio e dignidade muito mayor que chamão pimpuscilan, que he hum dos tres principaes do conselho da guerra que tem o rej."

¹¹ 同前書，頁273：“Quest'anno nel mese d'aprile stave nella città di Sciauceo et, appena havevo finite di introdurre il P. Lazzaro Cattaneo in luogo del P. Antonio d'Almeida e Francesco de Petris, che passò di qua un grand'huomo di questi regni che andava alla gran corte di Pachino ad un officio che è come consigliero di cose di Guerra, et, per la fama diceva haver udita di noi, ci voles parlare e specialmente perche menava seco un suo figliuolo di ventidue anni che gli impazzi e sperava per mezzo de nostre oratione risanarlo.”

¹² 同前書，頁297：“Quest'anno nel mese di aprile ci venne una occasione di passare avanti con un gentilhuomo molto principale, che iva a Pachino, corte del re, ad entrare in un officio

利瑪竇的第三封信，清清楚楚說明 Scielou 是姓名。德禮賢將 Scielou 解讀為「石老」，再引申考為石星，實在有點牽強。上述利瑪竇第一封提到這位兵部侍郎的信，是稱呼他 Xeye 的。按葡文 xe 音便是英語 sh 的發音，亦略同於意大利文 sc 的發音。Xeye 就是 Xe 爺，也就是 Xe 老爺，是利瑪竇對這位大官的尊稱。故此，德禮賢將 Scielou 解讀為「石老」便不合理了。一個西洋傳教士，在廣東人眼中的「番僧」，不可能以「石老」來稱呼一位朝廷大官。反而，稱呼「爺」或「老爺」正是以下尊上的正確稱呼。問題是葡文的 Xe 與意文的 Scie，到底代表了哪一個中文的姓呢？德禮賢讀「石」，在音韻上不無道理，可是石星的官職遷陞、籍貫生平，與利瑪竇的描述絕無相配的地方。考訂 Scielou 的身分，單從發音作出發點，是不能夠解釋疑難的。

三・石星、孫鑛與抗日援朝

我們再從另外兩點去探討這個問題。第一點是確定哪一個人是在一五九四年被任命為兵部侍郎，經略朝鮮軍務。第二點是探索這位兵部侍郎為兒子尋醫治病的背景。

日本擾略朝鮮，陷漢城，破平壤，勢如破竹，朝鮮乞援，神宗拜山東巡撫宋應昌為兵部右侍郎經略朝鮮，並命李如松為提督，率大軍以援。李如松初戰告捷，收復平壤，好勝輕進，欲取漢城，結果中伏大敗。明師氣奪，遂起和議。宋應昌考量朝鮮和戰之事難辦，引疾乞休，上乃召為兵部左侍郎，而命顧養謙代之。顧養謙，字益鄉，南通州人。他這個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軍務，經略朝鮮，做的時間也不久。

上任後，顧養謙聽從石星的策略主張撤兵，並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石星游客沈惟敬，周游中日雙方，誤事害國，根本不曾反映豐臣秀吉的要求：日本新霸者對明朝口氣強硬，要求不止貢市，更迫神宗和親，豈是明朝單單一個封號便可解決。中日和議的種種問題洩露出來，京師大批言官極為不滿。給事中王德完先上疏彈劾石星，責石星養虎為患，「欺君誤國，是惟敬誤星。星與經略總督

principale del collegio o consiglio di cose di Guerra, che era di cognomen Scie e di soprannome Lou, che per questo chiamano Scielou.”

誤陛下」。¹³ 其他的言官又紛紛上疏彈劾石星與顧養謙。及顧養謙真的請封貢，並准許日本開市寧波，朝野大譁。石星於是舉棋不下。這是萬曆二十二年（1594）夏、秋的事情。在朝野的攻擊下，做了一年朝鮮經略的兵部侍郎，顧養謙又上疏乞休，並推薦孫鑛替代自己。¹⁴

一五九四年冬，朝鮮王李昞上書告急，請封倭以保國。神宗又發了一頓脾氣，降罪前議事者，責切石星不能主張大事。和議冊封既定，遂於一五九四年底召日使入京商討條件。神宗決定派遣李宗城、楊方亨、沈惟敬出使日本，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這是一五九四、九五年冬的事情。

日本封貢的問題，在朝廷進行了很激烈的辯論後才成為定策。以石星為首的兵部主和、以言官為首的眾卿主戰，當時任職刑部左侍郎的孫鑛在這次激烈的辯論中，首次為神宗青睞。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四日（1594.05.23），顧養謙上奏，力稱不從封貢則不能保朝鮮，並推舉趙參魯和孫鑛二人：

總督顧養謙奏稱，許封不許貢之說，發之自內。惟敬之入倭營始終無此說也。今惟有許則並許，絕則立絕而已。輔臣王錫爵遺書於臣，欲臣盡言，彼且力為擔當。石星亦誓以死報國矣。如用臣議而立許之，則擇才辯武臣為正使，惟敬齎詔冊隨至大丘。今惟敬先諭諸酋帥兵渡海，然後使臣入國封貢，既成，可保十年無事。如用諸臣議而立絕之，則棄置朝鮮自鴨綠以西為守擋，既絕封貢，而欲保朝鮮，臣必不能任也。以臣所知，非吏部左侍郎趙參魯，刑部左侍郎孫鑛不可。蓋二臣見信於諸臣無阻撓之者，事乃易集耳。今宜速遣科道與使臣偕行，如至大丘倭果盡去，便如前說，否則今使臣繳還一切，取裁於科道臣不敢，興不出數月，而事可定矣。敕會九卿科道議聞。兵部會九卿科道謙聞。¹⁵

在言官猛力攻擊負責朝鮮兵務的文武諸臣下，神宗遂採取顧養謙之議，在四月二十九日（1594.06.17）改孫鑛為兵部左侍郎。¹⁶

¹³ 徐乾選，《明史列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第10冊，頁4205。以上明朝經略朝鮮、和戰爭執、職官陞革，見書中〈石星傳〉，包括顧養謙、孫鑛、邢玠等人的事蹟，頁4199-4217。

¹⁴ 同前書，第10冊，頁4205-4206。

¹⁵ 《神宗實錄》（收入《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66〕），卷二七二，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壬子，頁5045。

¹⁶ 同前卷，萬曆二十二年四月丁丑，頁5055。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九卿科道奏旨會議基本上反對封貢，主守戰。石星綜合眾議，上書神宗條陳三個策略：（一）「或降敕一道付小西飛（日軍主將）歸諭關白（豐臣秀吉），盡撤釜山兵，以觀誠偽」；（二）「或遣使往諭，必如中國約，乃許倭使具表皆來請封。及守鴨綠以西宜盡責督臣則請如孫鑛議」；（三）「或封貢立絕，自修內備，今朝鮮淬礪圖存，而我遙為聲援，兵餉俱難再助」。¹⁷

要應付與日本和戰的棘手問題，又要回答同僚無情的批評，石星頭痛不已，引病求歸，但是神宗以邊事緊急，不准石星辭職。¹⁸ 朝廷意見紛紛，即使是在兵部內也有矛盾，正如御史梁金右奏疏所說：「顧養謙與石星計主封貢，而鑛議在戰守。鑛當會議則面折石星之非，條禦倭則盡違養謙之意。養謙舉鑛自代必陰圖所以窘之。欲釋窘鑛之疑，當務為助鑛之實。」¹⁹ 孫鑛對日的強硬態度，在朝廷中樹立了正面的形象，兵部科臣吳文梓也反映了朝野中有以鑛代謙的意見。²⁰ 兩個月後，神宗果然以兵部左侍郎孫鑛兼任右僉都御史，代顧養謙總督薊遼經略。²¹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神宗壽誕，差一點亡國的朝鮮國王照例差臣進貢。為了天朝的面子，皇帝也急於解決朝鮮的問題。萬曆皇帝一方面試探日本和談的誠意，另一方面徵調有禦倭之名的浙將浙兵增援遼東。身為浙人的孫鑛自然是皇帝眼中能夠獨當一面的重臣。正好這時候御史林道楠不識時務，批評以鑛代養謙為非所用，神宗大怒，下諭：「上次遼左多事，孫鑛夙負才望，特茲專任。用舍大權出自朝廷，林道楠妄言淆亂軍過大計，罰俸一年。」²²

等待兵部的決策時，朱翊鈞已經很不耐煩。九月甲申又有福建道御史冀體兩次上疏直諫，有「倭虜交証，不能整頓」等句。結果神宗「覽疏震怒」，降了冀體三級外調，又緊接著下諭促兵部謀定方略：是戰、是和、是禦？若是和議，或封、或貢、或市？²³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1594.10-11），日軍已退守釜山，但是沒有撤軍的跡象。石星等亦因千里用兵為兵家所忌而舉棋不定。神宗很不滿意，下嚴諭責罵「昔之

¹⁷ 《神宗實錄》卷二七三，萬曆二十二年五月戊寅，頁5057。

¹⁸ 同前書，卷二七三，萬曆二十二年五月戊寅，頁5063。

¹⁹ 同前書，卷二七三，萬曆二十二年五月丁酉，頁5066。

²⁰ 同前書，卷二七三，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己亥，頁5066-5067。

²¹ 同前書，卷二七五，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庚辰，頁5088。

²² 同前書，卷二七六，萬曆二十二年八月庚申，頁5113。

²³ 同前書，卷二七七，萬曆二十二年九月甲申，頁5124-5125。

建議者，默默無言，任事者，泄泄自處，國事安危豈得晏然？」²⁴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1594.11.27），孫鑛與遼東巡撫議得一策，總而言之，即「戰守、羈縻不妨互用」。孫鑛建議在朝鮮設一憲臣，統理朝鮮軍務，又留一支軍隊，以監視釜山的日軍，防止其復襲。在軍事方面，明朝「暫息兵力，以逸待勞」。至於封貢則不准許。如果日方只願冊封，「即令盡數歸巢，明立約束，永不生端，然後斟酌具奏。如仍前觀望，必懷狡謀，即當將小西飛放還，明示拒絕」。在增強防禦上，孫鑛又言「禦倭不可無南兵」，建議募補浙兵。²⁵

稍後，石星亦上一疏，請冊封豐臣秀吉。他的理由是日軍已退還朝鮮王京，送回王子，退守釜山。明朝「欲封不封，既已失信」。石星建議一面令小西飛進京確准冊封，一面諭令釜山的日軍靜待冊使。冊封成，朝鮮保；不成，朝鮮必失。石星悲觀地指出，現在兵疲餉竭，明朝根本沒有國力作持久戰。不封的後果「乃不為中國而為屬國，是舍腹心而救四肢也」。疏末石星又言冊封後要是日軍不退，便請神宗治罪。²⁶ 萬曆皇帝批准了這個奏摺，詔日使進京許冊封。萬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冬，和議冊封既定，這個外交任務便由石星主持。孫鑛之事，主要是獎賞戰士，慰祭陣亡士兵。²⁷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神宗令特使沈惟敬前往釜山諭日將，答應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又說以前因朝鮮不肯代傳冊封的要求，導致兵禍；而今准許冊封，日軍必須全撤，不得生事起釁。²⁸

在這個時候，兵部內又出現了分歧。孫鑛上疏請求：停止遣使冊封，理由是他派往釜山的人員回報，日軍完全沒有撤兵的動靜，故此，他懷疑日方有詐，明軍應該增援圍剿。石星卻強力反對，上疏陳說「封事已成，使臣已行，中國不可失信」。再者，孫鑛僅聽片面之言，日軍情況不至於此。²⁹ 最後，神宗還是聽了石星的意見，希望用冊封來平息朝鮮的戰爭。二月底，朝廷在北京郊廟祭告遼東奏捷；在神宗的眼中，抗日援朝以勝利結束，而不知道這僅是勞師十萬、歷時八年的戰役中的一個停戰。

²⁴ 《神宗實錄》卷二七七，萬曆二十二年九月甲申，頁5127-5128。

²⁵ 同前書，卷二七八，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庚申，頁5141-5143。

²⁶ 同前書，卷二七八，萬曆二十二年十月丁卯，頁5145-5146。

²⁷ 同前書，卷二八一，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丙申、乙亥，頁5199-5201。

²⁸ 同前書，卷二八二，萬曆二十三年二月丙午，頁5208-5209。

²⁹ 同前書，卷二八二，萬曆二十三年二月癸丑，頁5214-5216。

冊封一事，後文再論。在萬曆二十三年三月（1595.04），兵部的大員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三月以後，《神宗實錄》有半年的時間沒有孫鑛的奏疏。在這段時間，戰事已告一段落。國事稍斂，孫鑛便趁著這個機會離開京師回鄉料理家事。萬曆二十二年孫氏四兄弟，孫鑛只剩下一個在家鄉臥病不起的兄長。被病魔纏身的孫鑛，上書十次終於辭去吏部尚書的官職回鄉養病，卒於萬曆二十二年七月五日（1594.08.20）。³⁰ 那時候，在京師的孫鑛正忙於治理朝鮮軍務，至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冊封已定才能夠分身回家為兄長治喪。

孫鑛的第二個家憂是兒子沒有考上秀才，積憂成疾，多方醫治無效。萬曆二十二年五月（1594.06），京師試選貢生，孫鑛的兒子大概在這場落選了。到了萬曆二十三年春，看見兒子已經沮喪消沈了將近一年，孫鑛怎能夠不憂心如焚？萬曆二十三年春孫鑛遠道赴涉浙、粵，就是操心這些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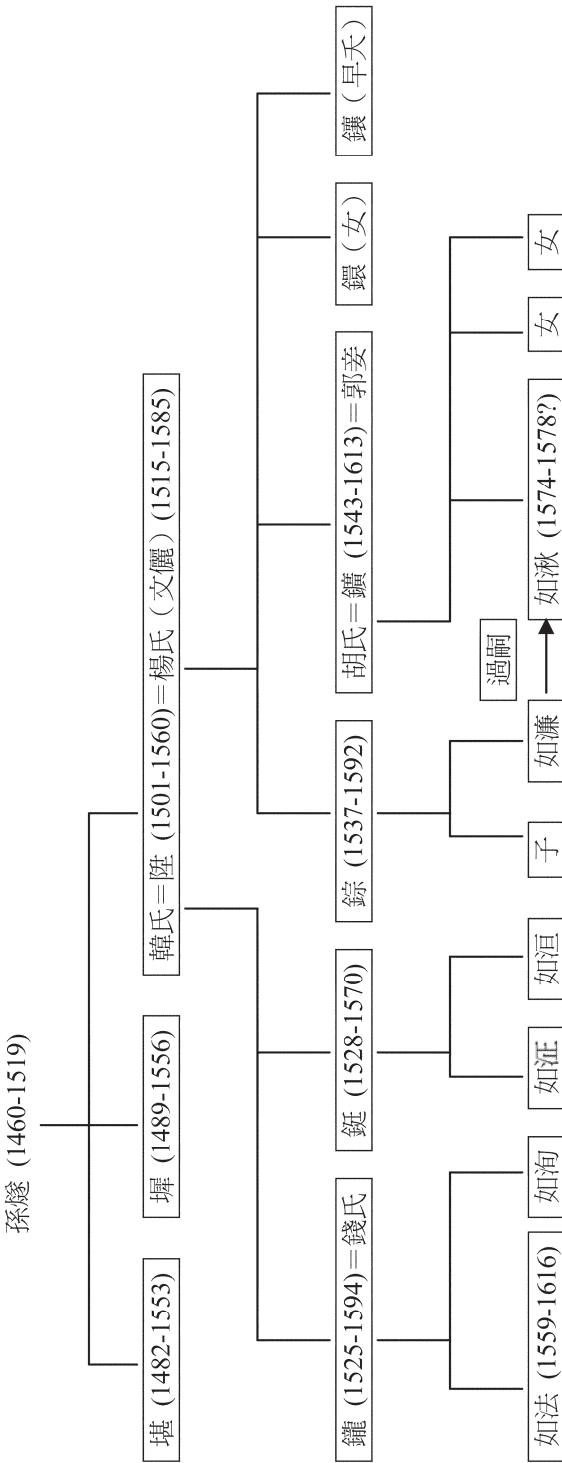
四・月峰先生

孫鑛，字文融，號月峰，浙江餘姚人。他出生名宦，書香世家，祖父孫燧以御史巡撫江西。正德十四年（1519），寧獻王朱宸濠造反，南昌官員大都屈服附從，只有孫燧寥寥數人誓死不從。後王陽明平叛，孫燧贈謚忠烈公。燧有三子，幼子陞（約1500-1560）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孫陞有四子，皆仕：長子鑑任南京戶部、兵部尚書；次子鋌官至侍郎；三子鎰為太常僕卿；幼子鑛亦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告老歸籍。³¹

上海圖書館所藏《餘姚孫境宗譜》卷二有呂胤昌撰〈大司馬月峰孫公行狀〉一文。呂胤昌是孫鑛之甥，從〈行狀〉一文，我們知道孫鑛的父親孫陞有二配：長子鑑，次子鋌為韓夫人生；而三子鎰、一女，與鑛則出自楊夫人。鑛生於一五四三年（嘉靖二十二年）於京邸，少年在北京長大。一五九五年鑛以父廕授國子監去南京，九六年五月父薨於南京禮部尚書職位。（參見世系表）

³⁰ 孫鑛的生平與萬曆二十一年吏部和內閣的衝突，見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一四，〈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明史列傳》卷一一二，〈孫鑛傳〉。

³¹ 孫氏三代的事蹟，見過庭訓纂，《本（明）朝分省人物考》（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天啟二年刊本影印，1971），第14冊。



夏伯嘉

江、浙是明代文化、經濟的中心，科舉進士人才濟濟。孫家又是餘姚大族，書香世家，親結士宦。孫鑛的外舅胡正蒙，亦餘姚人，太常卿，管國子監祭酒事，官至禮部侍郎。鑛的三個哥哥亦仕途暢通：大哥鑑是嘉靖丙辰進士，於一五六三年自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陞武選協司郎中，一五六九年擢南京尚賓司卿，後陞南京鴻臚光祿寺卿；二哥鋌一五六七年以編修充經筵官遷翰林院侍讀，後兩年陞國子監祭酒，一五七〇年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同年以肺疾死，四十三歲；三哥鑑於一五六八年登進士，後任為福建道監察御史、宣大巡按御史、廣東提學副使等職。

四個兄弟中年紀最小的孫鑛在家鄉陪伴母親為父親守喪。及一五六二年服除，兄等奉母楊夫人祿養京師，鑛亦隨侍請從。鑛自幼好讀書，經、史、子、集無不博覽，〈行狀〉說他「未冠而慕修辭，常篝燈夜讀，達旦不寐，年未二十即患目疾」。一五六五年母楊夫人五十壽，鑛年二十四。一五七一年孫鑛參加京師會試，沈一貫任同考官；孫鑛榜上有名實拜沈一貫之故。沈一貫是寧波人，一五六八年與鑛的三兄鑑同登進士，對這個浙東老鄉可算是獨惠。中舉後殿試，孫鑛中二甲第四名進士，〈行狀〉說：

時首輔江陵張公子未得雋，卷亦沈房，遂憾沈，並怒公，抑置二甲，停館選。孫鑛授職兵部職方司主事，轉禮部主客司主事。³²

一五七四年（萬曆二年）是孫鑛人生中關鍵的一年：中舉授官後，行大婚，娶同邑胡正蒙女兒為夫人。這年間唯一的陰影是無意得罪了權臣張居正。孫鑛任職禮部主事，官位不大不小，優閒之餘藉史、詩、書、畫自娛，以文會友，結交馮夢禎、屠隆、鄒元標等人。一五七七年張居正喪父，依禮法國典，張居正應罷官居喪三年。可是，正在推行新政的首輔不願功半而廢，而年輕的萬曆皇帝也怕失去朝廷的支柱，遂以「奪情」留職守喪，激起言官斥張居正。神宗力排眾議，廷杖黜戍諸臣。孫鑛長兄憤然乞病歸，家居七年，至張居正死後才再出仕。留在京師的孫鑛官也不好做。這幾年間，鑛任職吏部，自稽勳員外郎調驗對、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四清吏司，各置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郎一人（從五品）。四清吏司中，以考功最具關鍵。孫鑛為官考功郎中，五品，官位不算高，但是職責很重要。《明史·職官》曰：

³² 呂胤昌，〈大司馬月峰孫公行狀〉，孫梁盛等纂修，《餘姚孫境宗譜》（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浙江餘姚一九三二年本），卷二，頁10a-b。

考功掌官吏考課、黜陰之事，以贊尚書。凡內外官給由，三年初考，留念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平常，不稱職而陟黜之……京官六年一查……外官三年一朝。³³

身為全國五品之上的官員考察的主要負責人，孫鑛的影響力真的不小。偏偏張居正自視高傲，推展新法不遺餘力，反對者罷斥，贊同者陞遷，在人事遷動考察上，內閣與吏部便常常衝突。〈行狀〉記載：

壬午（萬曆十年）調考功時江陵勢愈尊，章疏下部，公題覆常持正不阿，大與閣忤。江陵弗善葉。會彼歿公始得與太宰嚴公清精汰外吏。一稟至公，凡以柔媚進者貶削都盡。

萬曆十一年癸未典選，孫鑛大力支持平反曾彈劾張居正而罷官的余懋學、趙用賢、吳中行、沈公愚、鄒元標、朱鴻漠、王用汲，與郭惟賢。諸人中，余懋學第一個上言批評張居正，而趙、吳、沈、鄒四人彈劾張居正不守父喪、奪情戀位，皆廷杖、削籍、充軍。另外，朱鴻漠上書為各人鳴冤受處分，張位亦曾上疏為四人求情減刑。張居正死後，神宗親操政柄，查抄張府，黜削張黨，反對張居正的官員，沒有死去的，紛紛復職。萬曆十二年（1584）孫鑛陞太常少卿，官四品。太常寺掌祭祀禮樂之事，聽於禮部。陞官不久，次年，鑛母楊夫人逝世，享年七十。³⁴ 鑛回家守喪，〈行狀〉說他「哀毀茹素，棲息於月山舊廬者七年。海內稱公為月峰先生」。

天啟二年，過庭訓纂集的《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一，有一篇〈孫鑛〉的傳記，全文如下：

孫鑛，號月峰，餘姚人。甲戌（1574）會試第一，二甲四名，授兵部主事，調禮部，尋調吏部，歷稽勳驗封考功文選，管內外大計，區別精詳，輿情貼服。甲申（1584）陞太常少卿，丁憂復，除常少、右通政，擢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刑部左侍郎，改兵部經略薊遼，加陞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丙午（1606）加太子少保，回籍。文章事業卓然一時，固其識力之過人。至于忠孝大節，則得之家傳者素也。³⁵

我們將《本朝分省人物考》的〈孫鑛〉傳與利瑪竇記載的資料印證，有下列的結果：

³³ 《明史》卷七二，〈職官一〉，頁1737-1738。

³⁴ 雷禮纂，《國朝列卿紀》（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一三五，頁7054。

³⁵ 《本（明）朝分省人物考》第14冊，頁4596-4597。

- (一) Scielou 曾為「某省的巡撫、都堂大人」；孫鑛曾以都御史巡撫山東。
- (二) Scielou 曾「投閒置散居家」；孫鑛之父於一五六〇年（嘉靖三十九年）「以疾卒，壽六十」，³⁶ 因此，他的丁憂應該是母親去世解職的。在一五八五年，任職太常少卿期間母過世。丁憂守喪歸籍。
- (三) 《利瑪竇中國札記》說 Scielou 在南昌人緣廣泛，這應該是與他祖父死難於南昌，謚贈忠烈公之故。³⁷
- (四) 利瑪竇結識 Scielou 為一五九五年四月中旬，即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初。

五．「驅魔」的耶穌會士：羅明堅一五八六年紹興之旅

可是，比較〈孫鑛〉傳與利瑪竇的記載，亦有兩點值得商榷。第一，在《利瑪竇中國札記》裏，寫道 Scielou 是廣西人，家鄉離肇慶不遠。並且，Scielou 曾聽過耶穌會士在肇慶的聲名，才去韶州拜訪利瑪竇。德禮賢考證這一條的時候，找不出做過廣西巡撫又姓「石」的人。再者，在萬曆二十年間，根本沒有廣西人出任過兵部要職。《利瑪竇中國札記》約書寫於一六〇八年。這部回憶錄寫在北京，離利氏逝世只有兩年，離粵、贛舊事，卻有十四年之遙。利瑪竇在一五九五下半年的三封信裏，沒有一處提到 Scielou 的籍貫。而十四年後，回憶舊事，書寫天主教在華創教史，利瑪竇卻誤會了關鍵的一點。

孫鑛是浙江餘姚人。餘姚（今慈溪）在明代隸屬紹興府，而紹興與肇慶同音，再加上吳語腔的官話，聽起來紹興與肇慶殊難分別。的確是，孫鑛絕對有可能在紹興聽過這些「西僧」的名氣。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在利瑪竇的札記與書信是找不到線索的。利氏本人從來沒有去過紹興，但是《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段短短的文字，記載了兩個耶穌會士在紹興傳教的故事。這是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與麥安東 (Antonio d'Almeida) 於一五八六年一月至六月逗留紹興傳教之事。利瑪竇輕輕一筆：「兩位神父不諳中文，傳教不成功，後來回到肇慶」便交代過了。³⁸ 實際上，這件事情值得大做文章。

羅明堅 (1543-1607)，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與利瑪竇等十餘個傳教士，於一五七八年自葡萄牙到達印度果亞。一五七九年羅明堅轉調澳門，由巡檢員范禮安

³⁶ 見《本（明）朝分省人物考》第14冊，〈孫陞〉，頁4470-4475。

³⁷ Ricc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p. 346, N-448.

³⁸ 同前書，頁229, N-284.

神父 (Alessandro Valignano) 指派學習中文，準備到中國內地傳教。是時葡人居澳二十餘年，耶穌會在日本迅速發展教務。在澳門，很少有葡人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羅明堅是西方人學習中國語文與文化的先驅者。在沒有教材的艱苦情況下，羅明堅跟著年輕的中國教徒，看圖識字，一個一個漢字注音定義，慢慢編成一本中葡字典。³⁹ 隨著葡萄牙商人去廣州參加定期的交易，羅明堅是第一個用官話與明朝地方官交談的西方人。他的成功，實拜學習中文的勇氣。一五八三年羅明堅往肇慶開教，帶著比他年輕九歲的利瑪竇，兩個耶穌會士在肇慶艱苦創業。一五八八年羅明堅回去歐洲，從而退出歷史舞臺，剩下長袖善舞的利瑪竇，揚名史冊。羅明堅回到意大利後，寫成一本雜亂的回憶錄，一直埋沒在羅馬耶穌會歷史檔案館，罕有學者問津。這個事情，另有拙作介紹。⁴⁰

在羅明堅的手稿中，有一段記載他在紹興傳教的文字，在利瑪竇的著作裏是找不到的。羅、利兩人在肇慶的靠山，是知府王泮與同知鄭一麟。王、鄭二人不獨是同僚，更是同鄉，籍貫山陰。山陰便是紹興府內的一個縣。羅明堅是靠著這個關係，於一五八五年底從廣州跟隨王泮的一個兄弟北上的。王泮的兄弟來廣州賣貨，通過羅明堅的推介，很快與葡商交易成功。王家也很願意去招呼羅明堅兩位「番僧」。在紹興接待他們的是王泮七十歲的父親，也是羅明堅在浙江六個月內，唯一受洗的人。兩位「番僧」住在紹興王氏族祠裏，每天接見不少訪客。有一天，王泮的父親帶來了一個十五歲的王氏族人。這個儒生「染了鬼」（羅明堅語），不聲不響，沒精打采。家裏請了道士、法師驅魔，一個都沒有用。王氏請兩位「番僧」給他辟邪。羅明堅卻另有一番診斷：「他是讀書太用功，變了遲鈍笨呆，精神恍惚。」羅明堅將那儒生留下來，每天教他一些天主教義；麥安東亦教他輔祭彌撒，慢慢開導。結果「染了鬼」的儒生治好了，耶穌會士「西僧」有名了，很多人再去找他們，可是羅明堅診斷「這些人都真的發瘋而不是著魔」，不願意再去「驅魔」。⁴¹

³⁹ Michele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 comps.; John W. Witek, ed., *Dicionario Português-Chinês* (San Francisco: Ricci Institute, 2001).

⁴⁰ R. Po-chia Hsia, "The Jesuit Encounter with Buddhism in Ming China,"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s: Japan and China in Comparison, 1543-1644*, ed. M. Antoni J. Üçerler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09).

⁴¹ 耶穌會士羅馬檔案館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 〈中、日部〉 (Japonica-Sinica) 101 I號，頁48r-v, 90v, 91r-92r。

明人的小說裏，儒生為了中舉，熱衷功名，讀書讀到頭昏眼花，神志昏迷，鬼怪邪魔，趁虛而入。現代的說法，便是讀書壓力太大，考試失敗，受不了打擊，沮喪鬱屈是小事，精神崩潰、輕生自殺便是大事。王氏儒生與孫鑛的兒子，一個讀得神志呆鈍，一個落選沮喪無神，同樣是科舉制度的犧牲者。本文的推論是餘姚人孫鑛於一五八六年在紹興丁憂期間，認識曾為儒生驅魔趕鬼的羅明堅。耶穌會士回廣東九年後，孫鑛自己的兒子考試落第，精神沮喪，做父親的急著為心愛的兒子治療，記起了耶穌會士「西僧」的驅魔之功，專程去韶州拜訪耶穌會士。孫鑛為利瑪竇介紹此事之來龍去脈，利瑪竇將紹興誤聽作肇慶，因此有日後回憶錯把浙江當廣西之謬。

上述這個推論，在羅明堅的手稿可以找到另一個實據。在紹興，羅明堅與麥安東住宿於王家祠堂；王泮的父親給了他們兩個房間、一個廚房，前門通街頭，後門接河道。兩位番僧安頓好後，王老爺又設宴給貴賓洗塵，邀請親朋顯貴。宴座上有一位來自京師的大官，投閒在家鄉守母喪。羅明堅說這位大官請他念經為亡母超度，可是，耶穌會士回答說他的經文是獻給上主的，對亡人沒有用處，還好這位大官沒有覺得羅明堅不識擡舉，兩人談話尚算投機；話席之間，大官爽口答應丁憂期滿會帶羅明堅上京師。⁴²

這位在家守喪的京官是誰？羅明堅和麥安東兩位耶穌會士是一五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到達紹興的。曾在北京身任重職的人，是誰這個時候在紹興守丁憂呢？

孫鑛於一五八五年回紹興，一五八六年一月認識羅明堅的時候，尚在丁母憂，故此有耶穌會士誦經超度母親之請。筆者考證孫鑛應是羅明堅札記中的「在家鄉守母喪的京師大官」尚有另一個證據。孫鑛的文集收刊了他的一篇賀文：〈壽年伯樂山王翁七十序〉，這個王翁便是肇慶知府王泮的父親，招待羅明堅的王老先生：⁴³

夫先生吾山陰人也。有子曰泮，字宗魯，與余同舉進士。舉進士五年而先生年七十矣。

萬曆二年甲戌科，紹興一地便有十四人登進士，可謂人才濟濟；孫鑛與王泮同鄉、同科，相交不為奇。⁴⁴ 鑛、泮二人一五七四年進士，五年後王父七十大

⁴² ARSI, Jap-Sin 101 I, 46r-v.

⁴³ 孫如洵輯，孫元杏重校梓，《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藏嘉慶甲戌〔1814〕本）。

⁴⁴ 乾隆五十七年的《紹興府志》有孫鑛、王泮等十四位明萬曆甲戌進士之名；見李亨特

壽，是為一五七九年。羅明堅書寫王泮的父親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叟亦相符。從上述的幾個證據，我們可以肯定宴請兩位耶穌會士時座上客中的京官，應該是孫鑛無疑。

上述羅明堅札記記載了王老先生帶來一個十五歲的王氏族人，請「番僧」給這個「染了鬼」的儒生驅魔。兩位傳教士把這個儒生治好後，聲名大噪，很多人再去找他們。孫鑛對這個事情是一定知道的。再觀利瑪竇上述一五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信件：「……有一位大貴人經過（韶州）……他說聽過我們的名氣，想與我們談談他兒子的事情。他帶來了一個二十二歲的兒子，有點瘋了，希望我們能夠念經去把他治好。」耶穌會士的名氣，是能夠念經治瘋。這個名氣源自羅明堅與麥安東於一五八六年在紹興的行跡。《利瑪竇中國札記》與《書信集》(Lettere [1580-1609]) 中沒有記載這件事，大概因為羅明堅一五八六年夏從紹興回去肇慶後沒有跟利瑪竇提起這件事。這也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羅明堅與利瑪竇的關係發生變化，在傳教策略和個人關係上有矛盾；第二是耶穌會傳教士與知府王泮關係惡化，後者開始對他們冷淡疏遠，一則是王泮不高興羅明堅在紹興為他的父親施洗入教，二則是擔心他與西僧的關係會成為同僚攻擊的藉口。羅明堅的札記書寫於一五八八年離華返意之後，在耶穌會中一直沒有流傳；他在紹興為「染了鬼」的儒生治病，在《利瑪竇中國札記》與《書信集》亦沒有提及，表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

六・為子求醫

這個在一五九五年訪韶州的大官若是孫鑛，那麼他的兒子應該是生於一五七四或七五年左右。可惜的是，〈行狀〉記載孫鑛的家事很簡略。〈行狀〉記載了一五七八年（萬曆六年）三月孫鑛有事歸浙，攜帶胡夫人與二女同行；四月，鑛北還，留胡夫人與二女侍外母家居。〈行狀〉全文中，只有一處提到孫鑛的兒子：⁴⁵

配胡夫人，禮部侍郎胡公正蒙女，生子如湫，聰慧早故，後生二女。孫鑛另娶一妾郭氏，但無出。

修，《紹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影印，1975），第3冊，頁737。

⁴⁵ 呂胤昌，〈大司馬月峰孫公行狀〉，收入《餘姚孫境宗譜》卷二，頁10a-b。

孫鑛的兒子是哪一年死的，〈行狀〉沒有記載。傳統文獻如〈行狀〉與《家譜》，對家事傷痛，多隱諱不談，如利瑪竇的朋友瞿汝夔與兄嫂有通問之奸，不只被趕出家門，更在家譜除名。⁴⁶ 我們唯一知道的是〈行狀〉記載孫如湫早故，而繼配又無嗣：⁴⁷

公當以太宰次子如洵為嗣，而太宰錢夫人以長子如法未有子，禮重大宗不得繼。因議擇罔卿次子如濂為公嗣，今承廕授鞏昌府通判。

太宰則是孫鑛的伯兄鑛。自江陵奪情，孫鑛乞休歸里，一五八六年（萬曆十四年）以原官召進大理卿；後四年陞南都吏部尚書，轉改兵部，繼陸光祖召為吏部尚書。

孫鑛運籌吏部，一五九三年與首輔張位衝突，帝雖慰加留任，鑛堅決引退，歸家後卒於萬曆二十二年七月五日。⁴⁸ 鑛的長子如法，一五八三年中進士，官刑部主事，以諫阻神宗寵幸鄭貴妃進封觸上怒，貶為潮陽典史，後引疾歸。⁴⁹ 鑛的次子如洵亦於癸丑（1613）年登科。

錢夫人以長子如法未有子，反對次子如洵過嗣給喪子的孫鑛；家族再議選孫鑛的次子如濂為嗣，這件事筆者推測是發生在一五七七至七八年間。孫如法是一五八三年的進士，照理早已經成家立室；故「如法未有子」應該指七〇年代後期之事。孫鑛十八歲（1543）娶錢氏，長子如法生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在一五七七至七八年只有十八、九歲。錢夫人以「禮重大宗」為由，反對次子過嗣，擔心大宗男丁單薄，實在私心捨不得自己的兒子。又〈行狀〉一文說胡夫人「生子如湫，聰慧早故，後生二女」，也應該是指一五七四至七七年間的事情。⁵⁰ 〈行狀〉上述一五七八年鑛有事歸浙，帶著胡夫人與二女同行，沒有提到兒子如湫。這個「聰慧」的如湫是不是在三、四歲的時候早逝？而孫鑛把妻子與二女留在紹興的娘家，是不是為了慰撫一個傷心的母親呢？

⁴⁶ 見黃一農，《兩頭蛇》，第二章。

⁴⁷ 呂胤昌，〈大司馬月峰孫公行狀〉，收入《餘姚孫境宗譜》卷二，頁10b。

⁴⁸ 孫鑛的生平與萬曆二十一年吏部和內閣的衝突；見《趙忠毅公文集·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明史·列傳·孫鑛傳》。孫鑛曾臥病三個月，上書十次請求辭官回鄉才被允許。萬曆二十三年六月丙寅，神宗賜祭葬優待；見《神宗實錄》卷二八六，頁5310。

⁴⁹ 《明史·列傳·孫鑛傳·孫如法傳附》。

⁵⁰ 呂胤昌，〈大司馬月峰孫公行狀〉，收入《餘姚孫境宗譜》卷二，頁10b。

綜合上述幾段文獻，我們推測一五九五年韶州之行，孫鑛身邊帶著的是二十出頭的過嗣兒子孫如濂。而這個過嗣的獨子沒有考上秀才，有點瘋了，做父親的孫鑛怎能不焦急憂心？既然知道羅明堅、麥安東的「驅魔」盛名，他去廣東找「番僧」為兒子治病是很可以理解的。再者，孫鑛是認識粵北韶州的，有詩為證；他的一首五言古詩〈題李贈君卷〉曰：⁵¹

生居曲江卿，早聞白沙教。相業未展醞，正學潛窺奧。桂水遠清冷，韶石聳奇峭。

李贈君何人，《明儒學案·白沙學案》未列，待考。曲江縣則位於韶州府城。利瑪竇於一五九五年四月十八日跟著孫鑛離開韶州北上。一行人馬浩蕩，翻越梅嶺，沿贛江順流北上，至贛州沿岸兵馬儀仗林列，利瑪竇印象深刻。眾人一行船隻在十八灘遭遇強風，利瑪竇的坐船翻沈，幾被淹沒。到達吉安，孫鑛家眾轉陸路進京，留下利瑪竇與孫家家僕沿江繼續坐船前往南昌、南京。一路風險奔波，利瑪竇沒有機會給孫鑛的兒子解說天主教義，誦習經文，並為他驅魔治瘋。

利瑪竇與孫鑛在吉安分手，以後再沒有接觸。雖然耶穌會士「番僧」沒有將孫如濂治好，這個年輕人也慢慢從考試失敗的精神打擊中恢復過來。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援朝抗日勝利論功行賞，孫鑛恩准廕一子國子監讀書。⁵² 不過，如濂好像科舉不太得意。一六〇六年孫鑛一子承廕，如濂授鞏昌府通判，授六品官。孫鑛卒於一六一三年（萬曆四十一年）。他去世後五年，浙東學道蔡獻臣為孫鑛寫鄉賢碑，曰：「大臣風節，宜躋俎豆，以示楷模……」，極力支持送孫鑛像入鄉賢祠崇祀。可是，有人民訴訟於地方官，以孫鑛「嗣子未定恩廕」為理由而反對。「使舉筆可成之案，為經年不決之疑」。蔡獻臣希望「府縣官速將本官應繼姪男，按彼倫序，質我神明，有向艱之難任，亦無嫌之足避」。⁵³

如濂有二子、一女；孫鑛亦後繼有人。

⁵¹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126冊），卷一。

⁵² 《神宗實錄》卷二八八，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乙酉，頁5354。

⁵³ 蔡獻臣，《清白堂稿十七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第六輯，第22冊），卷三，〈行餘姚孫月峰尚書鄉賢碑〉（戊午，1618），頁77-78。

七・疑惑與結論

解釋了《利瑪竇中國札記》的一個謎，卻還有另一個問題：怎麼去解讀 Scielou 這個意文拼音應該代表了哪一個中文姓名呢？上文提到 Scielou 是姓名共寫，應分為兩個字。利瑪竇時代，西方傳教士尚未有系統性的去編纂中西字音對照。西方第一本以音劃的詞典，要待明末耶穌會士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編纂《西儒耳目資》⁵⁴ 的出版。Scielou 一字又分兩音，前為 sh，是一個塞擦音，與「石」、「孫」兩字的首音相同；後為 ie，是一個雙母音，與「石」字的尾音 i 比較相近。雖然 ie 音亦與「孫」字的尾音有相近之處，可是「孫」字尾音，不論是官話或方言，是有明顯的 n 尾音。利瑪竇為什麼不將「孫」拼成 Scien 或 Sun，本文不能解釋，有待歷史語言學專家研究明末吳語發音可能可以進一步分析。從音韻方面來推測，「孫」字尾音 n 與 lou 的首音 l，兩個都是舌尖音，連讀起來快一點變成同一個輔音。那麼孫鑛怎會書寫為 Scielou 呢？Lou 音與吳語「鑛」很相近。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利瑪竇將孫鑛與他的哥哥孫鑑混為一人。

總結上述幾項分析，可以作出下列的結論：

- (一) Scielou 一人不可能是兵部侍郎石星。
- (二) 從生平、遷陞，從利瑪竇的書信與羅明堅的回憶錄，我們推斷 Scielou 一人最有可能是一五九四年陞任兵部侍郎，經略朝鮮軍務的孫鑛。
- (三) 從發音與拼音角度去看，Scielou 有可能是孫鑛的羅馬拼音寫法。可是，單從音韻的推理尚不能百分之百確定。至於利瑪竇是否混淆了孫鑛、孫鑑兩兄弟，這就是沒法解答的謎。

利瑪竇在南昌三年，結交明朝親王、王學宿儒，寫作《交友論》和《西國記法》，以西方的天文、數學知識，揚名士林，混跡官宦，後躋身南、北兩京。

孫鑛及首輔沈一貫皆為浙江人，力排封貢開市寧波之議。及孫鑛委任為兵部侍郎經略朝鮮，封議已定。孫鑛不信任撤兵的誠意，上疏請改封豐臣秀吉為順化王，與石星意見衝突。萬曆二十四年秋 (1596.10)，明使抵日，豐臣秀吉倨辱明使，復遣兵大犯朝鮮。和談破裂，神宗怪罪，罷免石星與孫鑛。萬曆二十五年九月，日軍大捷，神宗大怒，逮石星下獄論死。石星本無籌略，文人不懂軍事，又

⁵⁴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誤聽小人，致敗死。孫鑛罷官後，邢玠繼為總督朝鮮軍務。豐臣秀吉死，日本內亂，大軍盡歸，邢玠推功孫鑛，後任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後採礦事出，人噪眾亂，孫鑛發兵鎮壓，被御史彈劾濫殺無辜，三疏求去，離職歸籍。

神宗援朝抗日，三度出兵，更換總督撫六人、陞降十四將，費餉數百萬，首尾七年。孫鑛只是這一場戰爭中，增兵換將的一個人物。可是，他的出現，把利瑪竇從廣東的僻遠角落，帶上了歷史的大舞臺，可以說是有緣份。

(本文於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六日收稿；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蒙國立清華大學的黃一農教授與香港理工大學的朱鴻林教授指正。在音韻學上作者曾向中央研究院的丁邦新院士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張雙慶教授請益，並再次致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126冊。
- 《神宗實錄》，收入《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66。
- (明)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收入(清)劉凝編，《天學集解》，荷蘭：萊頓大學東方圖書館複印本。
- (明)過庭訓纂，《本(明)朝分省人物考》，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天啟二年刊本影印，1971。
- (明)雷禮纂，《國朝列卿紀》，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明)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蔡獻臣，《清白堂稿十七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第六輯，第22冊。
- (清)孫梁盛等纂修，《餘姚孫境宗譜》，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浙江餘姚一九三二年本。
- (清)徐乾選，《明史列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利瑪竇，《利瑪竇全集》，劉俊餘、王玉川、羅漁譯，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全四冊。
- 李亨特修，《紹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影印，1975。
-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孫如洵輯，孫元杏重校梓，《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香港：香港大學圖書館藏嘉慶甲戌(1814)本。
-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ARSI). Japonica-Sinica 101 I.
- Ricci, Matteo (利瑪竇) *Lettere* (1580-1609), edited by Francesco D'Arelli. Macerata: Quolibet, 2001.
- .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Vol. I of *Fonti Ricciane*, edited by Pasquale D'Elia. Rome, 1942-49.

Ruggieri, Michele (羅明堅) and Matteo Ricci, comps.; John W. Witek, ed.
Dicionario Português-Chinês. San Francisco: Ricci Institute, 2001.

二・近人論著

林金水

1996 《利瑪竇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一農

2005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Hsia, R. Po-chia (夏伯嘉)

2009 “The Jesuit Encounter with Buddhism in Ming China.”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s: Japan and China in Comparison, 1543-1644*, edited by M. Antoni J. Üçerler.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Who was “Scielou” in the *Fonti Ricciane*?

R. Po-chia Hsia

Member, Academia Sinica;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Religious Studies Program,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Based on a careful reading of Chinese records and Jesuit sourc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person known as “Scielou” in D’Elia’s edition of the *Fonti Ricciane* as Sun Kuang and not Shi Xing (the person commonly assumed to be “Scielou”). As the Vice-Minister of War for China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Korea, Sun Kuang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Matteo Ricci’s patrons and also provided for the Jesuit’s departure from Guangdong.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Sun Kuang’s lineage as well as his encounter with another Jesuit in 1586 (Michele Ruggieri),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his meeting with Ricci in 1595.

Keywords: Sun Kuang, Sun Long, Matteo Ricci, Michele Ruggieri, Japanese invasion of Korea in 1592